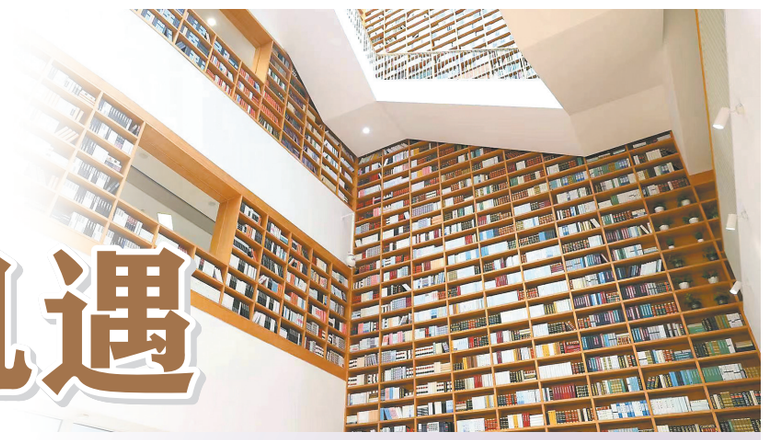
葛剑雄

葛剑雄：相信时代的大机遇，也要抓住个人的小机遇

文\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图\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


图书馆里的“书墙”

深圳龙岗区神仙岭山峦起伏、沟谷蜿蜒，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【以下简称“港中大（深圳）”】依山就势而建，校园内光影斑驳，树影婆娑。作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、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文科博士之一，葛剑雄于今年3月开始就任这所美丽校园的图书馆馆长。拥有7年复旦大学图书馆管理经验的他，称此次任职为“年近八十，重操旧业”。

在校期间，葛剑雄每日早起，从学校给他安排的员工宿舍坐校车下山，来到图书馆上班，两点一线。包括午休时间，他每日的安排都满满当当的。也因此，虽然驻深两个月了，他还没好好逛过这座美丽校园。为了保持充沛体力，同时也是兴趣使然，他延续自己多年的运动习惯，每周至少争取一次晚上去游泳馆游泳。平日生活里，他习惯快走，既节省时间，又是一种很好的锻炼。

日前，葛剑雄教授接受羊城晚报专访——

1 “现代图书馆应该是公共空间”

“重操旧业”后，葛剑雄走访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各学院、收集对图书馆服务的建议、面向学生开讲座、接受媒体采访……这期间，葛剑雄在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工作也还在继续。

这期间，广东多暴雨，飞机时有延误，沪深两地飞的葛剑雄经常要在机场久候。他的记事本上标注了近期的行程，午休时间“见缝插针”安排工作或会面，行程安排写满了两页纸。

两个月时间里，葛剑雄和图书馆副馆长拜访了学校所有的行政部门和七大书院，与研究生会、留学生会等学生组织交流，听取他们对图书馆工作的期望。

他在思考，港中大（深圳）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，未来招收学生的规模也将有大幅增长，这些都意味着，图书馆的资源也要有很大的扩充。还有一些学院有开设图书馆分馆的需求。收集了学生意见后，葛剑雄对接下来图书馆的工作进行了规划，并计划上报学校。

工作不仅限于此。图书馆作为现代高校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，这位“重操旧业”的图书馆馆长如何看待图书馆的功能和定位？

葛剑雄认为，高校图书馆除了藏书、读书这个传统的功能外，它更应当是一个公共活动场所。“我们现在有很多数据库、电子书，这些网络资源是24小时开放的，读书没有了物理空间限制，也没有时间限制。学生不用到图书馆来就可以读书。目前很多图书馆里很多古籍，已经慢慢变成收藏。很多学生到图书馆来，多是来自习的。单单是自习的话，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设施，又是浪费了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读书不是为了学习和做研究，他们是想通过读书，获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，对于他们来说是心灵上的一种享受。他们需要图书馆，但不一定需要这么大的地方。书永远有存在的价值，但是其他设施和设计就不一定了。”

理想中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图书馆，应当是如何的？葛剑雄认为，大学图书馆位于校园中，它能最好地将老师与学生汇集起来，是很好的公共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需要开辟聊天的地方、开小型会议的地方，甚至是课题研讨的地方，“一边开会，一边跟图书馆里的资源做连线。这些区域通过好的隔音空间就可以实现了。”葛剑雄介绍，图书馆里还设置了3D打印设备，供学生建模。在有些学校的图书馆，全校最大的屏幕就设置在这里，图书馆还可以参照博物馆，设置艺术陈列品，供更多人观赏学习。

图书馆一角

2 “年近八十还要继续读书”

“从5岁上小学以来，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，没有间断过读书，一直受惠于图书馆。如今虽已年近八十，还是要继续读书，在馆内馆外和大家一起读书。”就任馆长伊始，葛剑雄在公开信中写道。

诚如公开信所写，葛剑雄在港中大（深圳）图书馆做了两场讲座，都是围绕“读书”，四月初讲“如何读书”，四月末讲“读书与人生”。

“工具和价值、选择和穷尽”，从小读书读到老，葛剑雄用了几组词语阐述读书的“方法论”。

从“工具”层面上看，读书是获得知识最有效、最简便的途径。从“价值”层面上看，通过读书获得精神的满足。在他看来，读书是很个性化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标准。不过，知识爆炸和信息化时代，他推介了一些共通的方法和准则。“以我们港中大（深圳）图书馆为例，每年增加大概1万本书，增加以10万计的论文。这么多书，则要学会选择。比如是读普及类的书，还是研究型的论文。”他提倡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选择，比如选择师长推荐的书单来读书，获得价值。

“选择”之外，葛剑雄提倡“穷尽”。“读书有时还不仅仅是为了求知，是为了研究、为了解决问题。这时候就需要‘穷尽’。”他举例，要研究一个课题，就需要完成一定的查阅。“一项研究有不同的作者、一本书有不同版本、国内外有不同的研究者。这些成果都需要我们‘穷尽’去查阅。如果无法做到‘穷尽’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，是否要缩小研究的范围。如果没有‘穷尽’，可能会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嫌疑，是做了无效劳动。”

他以自己研究中国移民史为例。“中国移民范围很广，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有中国的移民，而且涉及的时间维度很长，相关资料又涉及很多语种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研究全部时间跨度和维度的完整的移民史，所以我会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。”

图书馆还被认为是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。葛剑雄就任馆长，规划不止于此。“我保证在我的三年任期内，除了服务好图书馆外，也为提升学校人文教育尽最大努力。”在对他学生的答疑中，他反复强调，喜欢历史不一定要读历史学科，要提升人文素养也不一定要选人文学科。人文的教育不限于课堂，也不限于学科，甚至不限于职业，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读优质的书、听优质的讲座，都是途径之一。

当代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何在？“历史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，而艺术一般是反映人类社会精神的发展过程。眼前不一定看得出人文素养对一个人的影响，但这最终影响着整个社会。比如。社会精英的人文素养如何、价值观念如何，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会很大。”葛剑雄说。

3 “当今我们面临从未有过的好机遇”

身为历史地理、中国史、人口史、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，“老行尊”葛剑雄擅长运用自己的研究，做时代性的解读。同时因为身处高校，他也频频回答、回应年轻人的问题，用学术的思维理解当下。

当前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难题。葛剑雄曾经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史。中国人口数量14亿，目前居世界首位，回溯宋代人口突破1亿、清代突破2亿，相比同时代其他文明而言，都是相当可观的人口总数。

“过去，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高，一靠物质基础，二靠精神。”这里所讲的精神，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。在他看来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所有经济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。这是普遍规律，不必过于担心。葛剑雄认为，缓解当下人口数量下降、生育意愿不足的危机，可以通过弘扬孝道，对传统孝道作出新的解释，进行现代化转化。

讲座过后，还有学生提问，是否存在“人口规模陷阱”，即当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从人口中收取租金，便缺乏了创新的动力。葛剑雄表示，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，我国的人口从汉朝的6000万人到改革开放前接近10亿人，都是自给自足，社会并不鼓励人们通过创新去获得超常的生产力。而在大航海时代，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国等国家，资源有限、市场狭隘，有的甚至难以为生。所以才迫使这些国家通过海外航海去寻找新的航路，通过技术创新去发展经济。所以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历史依据。但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社会人口规模越大，天才也会越多。到了当代，人口规模与科技创新也可以是正面关系。

回到“读书”这个原始话题与科技的关系，葛剑雄认为，科技发达，但读书与做研究仍然无可取代，“AI可以写文章了，但它是建立在海量论文和数据库这个基础上的。除非有一天AI可以复制、生产神经元。”

“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可能都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机遇，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。全世界也都处在一个新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，这是大的机遇。但小的机遇，则受制于个人的局限性，个人所处领域的局限性。很多时候我们感到迷茫和困难，往往是因为没有小机遇。”葛剑雄说，在当下，他相信大机遇，但同时个人也要从自身所处的地域、行业去找问题、去改变，抓住小机遇。

【有感于思】 **阎晶明**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文学人应该补上文风课

前几天应约写了一篇关于改进文风的小文章，重点强调文风问题并非只是公文写作者和新闻报道者要面对的问题，很多文学写作者也有改进文风的任务。在提升文学语言品质的过程中，阅读经典，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，获得启示，从而改进文风，当是必由之路。

关于改进文风，可以探讨的方位和话题太多了，这里再谈一点——努力做到世事洞明。

从事文学的人总觉得，追求个性化语言是根本，所以不太注意阅读公开报道、报纸社论以及相关文件；或者，不从文字表达的角度关注这些文本。事实上，对于很多社情民意，很多重大问题，这些文本里常常有概括性更强、定义更准确的特点。很多具有历史感的命题，在概念的演变以及外延的拓展上，常常通过细微的语词差异来体现。无论是作家还是别的什么家，要对这些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命题有所了解和掌握，就很有必要通过学习研读相关的文本来获得。

我们知道，当年的柳青、赵树理等前辈作家，之所以能够在小说中很好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，而且直至今天仍然具有认识和欣赏价值，与他们不断地学习同时代的“非文学”类文本，并从中梳理出个人的认识、加入自己的思考有很大关系。路遥的文学道路，除了对自己选择的中外经典如饥似渴地阅读外，与系统地、完整地阅读长达10年之久的《人民日报》《陕西日报》，从中了解时代发展变化的踪迹，感受社会前行的脉动，从而进一步理解个人与时代、社会的关系，有直接关系。这一课，今天的文学人需要补上。

今天的文学人浏览网络多了，参与聊天多了，但阅读传统经典、系统学习时事文本少了；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把握，包括总结现象提升认识、掌握规律的能力弱了，由此对生活的表现力也就弱化了，这是更加致命的文风问题。

【拒绝流行】 **曹林**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教授

善良需要善良的滋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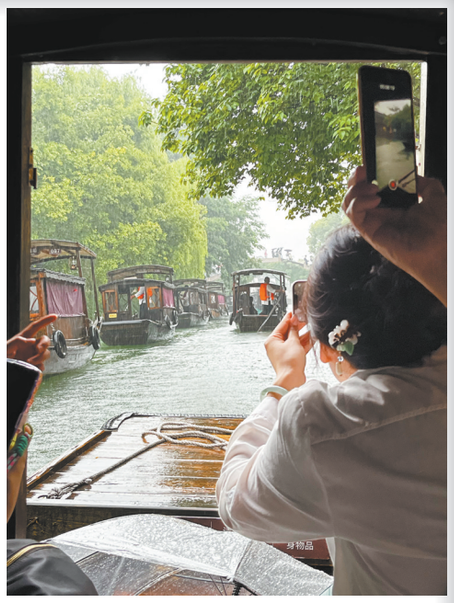
“流行语”各领风骚没几天，有的发馊发霉。你知道我当下最讨厌哪个“流行语”吗？没错，就是“泼天的富贵”。

——总觉得这个词的背后有一群不务正业而浑身躁动着流量荷尔蒙的人，等着流量雨从天而降，迷恋一夜暴富。哪有那么多“泼天的富贵”和流量神话？你我的日常和附近，街边小店人来人往，只有努力的凡人，没有泼天的富贵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报道中看到“公益小店联盟”那些凡人故事后，眼角会泛出泪光的原因。这些街边小店，确实都很小，走在街头不特别留意，你根本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，饺子店、面包店、理发店、面馆、包子铺，我们日常最普通的生活背景。他们做的好事也很琐碎细微，好像很难用媒体常用的“最美”“最帅”“最牛”去形容：身障人士可以半价吃串儿；店里面包只卖10块钱5个，遇到有困难的人还会免费送；进门只要报上“A套餐”，饺子馆就会为遇到困难的客人免费端上一碗饺子；义剪小店主们坚持给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洗头。

故事如果仅止于此，那只是街头普通的“好人好事”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敢轻易感动，甚至会觉得良心不安，那种鼻子一酸的感动是“自私”的：我们岂能心安理得地去“享受”这种无私的善良？每一种善行都有成本，他们帮助别人，谁来帮助他们？善良需要善良的滋养，公益需要公益的簇拥，这也是“公益小店”让人欣慰的地方，故事没有止于“单个好人好事”，而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网络：网商银行在2021年5月正式成立了公益小店联盟，有计划地帮扶公益小店，把众多媒体、企业、商家拉入联盟，尽己所能帮这群小店主分担成本，让“A套餐”式公益能延续下去，推动更多附近小店加入公益队伍，让“附近”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人情味的存在。

很喜欢一句话，社会的进步，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，而是，很多人都做了一点点——“公益小店联盟”这种机制，把附近的好人联合在一起，给好人以支撑，好人互相支撑，让每个人成为彼此附近的好人，让身边善行“日常化”，就是一种“很多人都做了一点点”的进步机制。哪有什么“泼天的富贵”，只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做一点点，善良的店主，热心的媒体，看见公益痛点的网商银行，有爱的普通人普通企业。



●随手拍

烟雨江南

图/文 黄光月

5月中旬，当我和妹妹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乌镇西栅景区内的时候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，坐在乌篷船中，真正领略到烟雨江南的美丽景色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【昙花的话】 **尤今** 新加坡作家

与野生动物相处三原则

早晨的阳光新鲜而又嫩滑，我和女儿在茂密的丛林里远足，树木在起起伏伏的呼吸里释放出特有的清香，熏染着绿意的蝉鸣听起来十分清脆。

远远地，女儿看到四五只小猴子在地上追逐嬉戏，她驻足，对它们说：“早安，猴儿！”猴子们吱吱唧唧地叫，仿佛在回应她，人与动物之间，体现了一种圆融的和谐。

从小，我便谆谆教导女儿与常见野生动物相处时的三大要诀：不必惧怕它们、不要喂饲它们、不可骚扰它们。一般上，除非性命受到威胁，猴子是不会主动向人类发动侵袭的。因此，每次女儿看到野生猴子，总会亲切地问候。这样的习惯，一直延续到成年。在她的意念里，猴子和人类，都是地球的子民，见面时打个招呼，是基本的礼貌。

我俩离开猴群向前走时，迎面来了一对母子，母亲三十来岁，男孩四五岁。母子俩看到猴群的态度截然不同。男孩兴奋地喊道：“妈，看！看那些猴子，多可爱啊！”母亲一见，脸色一沉，把孩子的手抓得死紧，说：“别，别过去！ 猴子会咬人！”说着，拖着孩子，易道而去。

我深感遗憾。

家长如果从小给孩子灌输不必要的恐惧，这种根植于心的恐惧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，日后看到猴子、蟑螂、壁虎、毛毛虫、蜈蚣，都会惊叫；生活里，草木皆兵，处处都是恐惧的阴影。

【不知不觉】 **钟红明**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梦想在彼岸

纽约与上海，是上海女作家唐颖多部长篇小说叙事的主要地景，而她最为核心的文学写作，是从时代变迁中描画女性的心灵景观，描摹人性深处的嬗变与纠缠其中的各色爱情，为一百年来“都市女性”画卷，增添了独特的风情。我一直相信，每位小说家，都有她各自非常擅长与投注情感更多的某段人生，关于这类故事的讲述，更能唤起共情。

唐颖刊在《收获》2024年第3期的长篇《淑女》，让我想起她的中篇《名媛》，我认定是有原型的，也从作家那里得到印证。不然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在上海暗流涌动近乎魔怔的“出国潮”，不会被她讲述得如此精彩。

小说是以多年后的一对闺蜜——小米与黎朵——在小剧场观看日本“舞踏”表演，展开整个故事的，而这种源自生命本真与灵魂纠结的日本舞蹈，似乎也成为整部小说的“眼”：在农场，小米与黎朵都是卫生员，资产家庭出身的黎朵拥有出众的美丽，却避免与爱情沾边，遭受女上司的折磨，却处事淡定，让出身普通家庭的小米深为仰慕。妖头、小头、黑鱼……最先跻身出国潮的他们，都有海外关系，试图摆脱农场的泥淖，敏锐地抓住时局变化，智商与选择的途径大相径庭，彼此暗暗掩饰秘密，但梦想都在大洋彼岸。

黎朵通过相亲嫁给美国二代移民律师，在小说开头，黎朵已经放弃在美国的十年婚姻“海归”，打理家族企业，并在房地产市场挣到第一桶金，把自己变成了富婆，对朋友出手大方。此时出现在小剧场的她，身穿名贵的服饰，与小剧场环境格格不入，却望着舞者挣扎扭动的躯体，落下了眼泪……黎朵一直秘而不宣的美籍男友费恩在小米眼里，远远地，似“惊鸿一瞥”，从事艺术行业，曾早早地向黎朵宣告他不会离婚，却享用着黎朵供给的优渥生活。黎朵觉察到他的其他恋情，心理防线决堤……

唐颖的作品，丰盈的细节是有独特审美格调的，她写出上海的这一群人的“时代表情”，大洋彼岸也并非幸福的终点，他们的挣扎和痛苦沉沦历历在目，尤其是写出在物质表象之下，在厚厚的岁月包浆之内部，几位女性始终对爱情怀有的真切而浪漫的念想。理想的人生在遥远的他乡，就像理想的爱人也永远在远方。

【名著识小】 **杨早**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“吃东西广州方便，谈恋爱北京方便”

说说“食在广州”的主体：小吃。

广州人的生意头脑是最灵活也最体贴的。1984年媒体报道过广州一家强身小食店，开业十年，经营的牛骨汤始终卖一角钱一碗，从不涨价，质量也是“十年一贯制”。即使有些配料升了价，牛骨汤仍然原价出售。他们的理由是：汤卖贵了，顾客会减少，宁愿每碗赚少一些，争取多卖一些。时代变了，广州人不但要喝便宜的牛骨汤，他们还要吃新鲜的牛肉！1984年3月29日，贵阳市副食品个体户袁永庆、李道章空运鲜牛肉392公斤前往广州出售，这是贵州省个体户第一次利用飞机进行长途贩运。四十年后，潮州牛肉丸卖遍全国，用的原材料很多还是贵州的鲜牛肉。

到1984年，广州的个体工商户有四万多家，其中40%从事饮食业，居民饮早茶、吃夜宵、品尝风味小吃，非常方便，以致广州副市长邓汉光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：“吃东西广州比北京方便，谈恋爱北京比广州方便。”他的意思是指当时北京市的商业网点少、个体商贩少，冷落的街面对于恋人来说倒是方便。

数字更说明问题。1983年，广州人均食用鲜鱼65斤，商品销售额达65亿元。对照北京，人口比广州多两倍，全年商品销售额却只有82亿元，至于活鱼，市场上基本买不到。作家陆文夫两次到北京，要汪曾祺做饭给他吃，都被汪婉拒，理由就是“买不到活鱼”。

【如是我闻】 **李雪涛**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我的大学

我读硕士和博士的波恩大学是1818年10月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·威廉三世（Friedrich Wilhelm III.）创建的，他从1815年起开始统治莱茵地区。波恩大学是继柏林大学（即今天的洪堡大学）、布雷斯劳大学之后，普鲁士秉承威廉·冯·洪堡精神新建的第三所大学。与柏林大学不同，波恩大学一直到1827年才获得完全符合洪堡大学改革精神的章程：教学与研究相结合，以及建立以哲学为重点的通识教育的要求。

波恩大学的学生中有很多即便对中国人来讲也不陌生的名人，如海因里希·海涅（Heinrich Heine, 1797-1856）、卡尔·马克思（Karl Marx, 1813-1883）和弗里德里希·尼采（Friedrich Nietzsche 1844-1900）。在政治人物中，除了第三帝国臭名昭著的约瑟夫·戈培尔（Joseph Goebbels, 1897-1945）之外，还有曾两次任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的威廉·马克思（Wilhelm Marx, 1863-1949）和康拉德·阿登纳（Konrad Adenauer, 1876-1967）……波恩大学在1907年也曾培养了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（Li Fo Ki, 1885-1947）。

2017年5月9日，波恩大学校长霍赫（Michael Hoch）一行来访北京外国语大学，时任校长的彭龙接见了代表团一行。作为日耳曼学学者的霍赫在讲话中的一开头就说：“对中国来讲，波恩大学肯定只是一所小大学，但我们也出过几个人物。我说出你们一定都知道三个吧：马克思、海涅和李雪涛。”引来了大家的一片笑声，我也很欣赏霍赫教授的幽默。